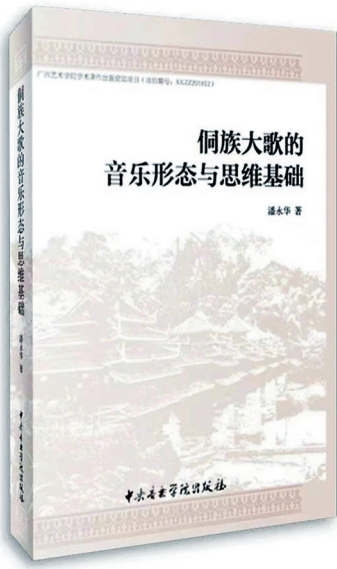


一本着实“厚重”的侗族音乐研究专著

——《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与思维基础》

□ 李 君



▲《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与思维基础》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今年元月中旬,广西艺术学院潘永华副教授把他的新作《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与思维基础》赠与我,并说让我写一个书评,顿时感觉“压力山大”,虽然2000年的时候我去过三江侗族自治县支教,对侗族音乐有所了

解,但让我对侗族音乐家的学术著作进行评论,还真不敢轻易动笔。晃眼半年过去了,我认真拜读之后,才有一点说话权。

侗族被誉为是“歌舞的民族”,侗乡被誉为是“歌舞的海洋”,我就像是在海边玩耍的游客,偶尔发现了一块美丽的贝壳,对于浩瀚的大海——侗族音乐,还没有更多的认知。而《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与思维基础》让我有机会再一次徜徉在侗族歌舞的海洋,去领略它的神秘、博大及奇妙的和谐,发现其中无数精美的珍宝。我几次三番打开这本书,阅读里面的内容,试唱其中的侗歌旋律,每一次都被作者执着的“侗歌情结”所打动。

“饭养身,歌养心”,对于一个土生土长,后来走出侗乡求学,成为侗族首位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双硕士的潘永华,“身在此山中”站在对本土音乐文化深究的角度,同时“身在山外”站在现代学院派的另一个角度,在“山外”有了更多的文化比较及文化探讨之后,为了更深入研究侗族大歌的文化内涵,回头来探寻家乡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和思维基础。为此,潘永华回到“山里”,进行了认真的实地采风与考察,他对寨老、歌师、村民等深入访谈,进行了抢救式的挖掘整理,为今后开展同类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其“双重身份”的优势,完成对侗族大歌少有的具有

深度、广度和厚度的研究,由此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与保存价值。

书中潘永华写到侗族大歌生成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侗族大歌在历史中的嬗变、流传区域及传承变迁,侗族大歌与民俗和节庆的关系,除了参考大量的文献如著作、论文近60部(篇),与自己亲自采风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进行科学对比,找到具有权威及可信的表述。侗族居住区的独特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环境,为侗族大歌的产生、流传与继承提供了沃土;他从歌源流考、民间传说、历代歌师的不同角度,论证侗族大歌的形成、发展、传承与侗族民俗“行歌坐夜”“月也”关联密切。

接着,潘永华从专业的角度,对侗族大歌的音乐结构、词曲关系、衬词、衬腔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及侗族大歌的旋律是受侗族人的音乐审美习惯和外在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构成,在侗族人的旋律思维中没有西方的和声概念,侗族大歌的横向线条是侗族大歌产生纵向声音美的重要因素。潘永华根据侗族大歌的演唱特点,就单声部旋律音程和多声部旋律音程分析,探索了横向旋律之间以及与横向旋律所构成的纵向旋律之间的关系。还谈及侗族语音及侗族大歌的歌词音韵,歌词与旋律、节奏的关系;衬词在侗族大歌中具有的特殊

结构性意义,根据它的音节数、演唱的时值和篇幅等,分为衬字、衬词、衬句、衬段;衬腔是侗族大歌中艺术特色的重要体现,与居住的地理环境、民族语言习惯、歌唱的审美习惯有很大的联系。

最后三章,其对侗族大歌的艺术特征和思维基础、形成的文化生态圈以及侗歌传承的新模式——侗乡歌会,进行了视角新颖的阐述。一直以来,对传统的侗族歌师进行传授侗族大歌的思维特征还少有研究,潘永华采用概念来探讨“思维”的途径,首先从侗族鼓楼的多层结构、花桥的构成、侗族服饰来寻求侗族人在视觉上体现固有的多层以及众低独高思维基础方式。因族群审美思维习惯,侗族人在听觉就出现了多声以及众低独高演唱方式,这就是侗族大歌形成的最主要的思维基础。地理环境与劳动生产、群居生活、民族风俗和民族语言五种因素连在一起,形成了侗族大歌的文化生态圈。潘永华亲力亲为,利用传统民俗创办新歌俗,提高群众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多年的积累和尝试,加上他在“非遗”语境下关于侗族歌俗淡化的思考,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春节,举办了首届“侗乡歌会”。这次“文化自觉”的实践尝试,给后来几次举办“侗乡歌会”带来了文化自信,也使得他多年的研究、采风、整理成书有了自信和底气。

本书附录有侗族大歌30首,也是这本著作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是潘永华深入侗乡收集、整理,由潘永华及其夫人夏鸿雁记谱,然后制成五线谱,歌词用侗语,歌曲后面附上汉语的歌词大意;这些歌曲直接为理论研究提供了谱例,《本色歌》《蝉之歌》《撑船歌》《春时花开》等30首原生态侗歌的采集,就是一项大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邓敏文在序一中写道:“侗族大歌为何如此迷人?”一直找不到满意的答案,阅读本书样稿后似乎能从中找到一些其“迷人”的真实或内在原因。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张伯瑜在序二中写道,潘永华所具有的表演者和研究者、文化上的局内人和研究上的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使其对相关材料交代细致入微,深入触及了音乐本体及与音乐相关的文化本质。“能够以研究者的视角整合出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并进行问题化和逻辑化的分析与陈述。”

确实,《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与思维基础》不仅手感“厚重”,打开来阅读、视唱也感到作者情怀和学术的“厚重”,在今天诸多音乐研究著作中,它就像侗族大歌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花园里独树一帜一样,有着特别的阅读、演唱与使用价值。

(作者系广西艺术学院教授)

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中华文化坚守

——评《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

□ 黄芊芊

由黄晓娟、张淑云、罗莹钰所著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终期成果,今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当代具有影响力 and 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及其创作为研究对象,从女性意识与女性经验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呼应,她们书写的文本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中华文化在这样的女性书写中得以传承、创新。目前关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综合性研究较少,主流的批评话语仍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价值来观照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忽视了隐含其中的女性立场,以及女性身份带来的文化、审美价值。该书的面世正填补了这一空白,具有非凡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统一体,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下,55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一起组成了花团锦簇的中华文化大花园。进入新时代,为延续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文化成果,党中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党的十九大更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尊重包容的基础上强调一体,既展现多元的包容性与带来的优势,又强调多民族的凝聚力量,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文化意识凝聚而成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土壤滋养出少数民族文学的花朵,而这些绚丽的民族文学又是中华文化的体现。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不仅传承了本民族文化,还认同、传承着整体的中华文化,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惟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唤起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自觉,一齐传承和发展中华

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一书作者的敏锐之处在于指出其中属于女性的部分,指出中华文化传承过程中被遮蔽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长期以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著作颇丰,而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未得以足够的重视,更鲜有从女性书写的角度去审视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问题。这部著作的意义由此突显,即寻得一个双重视角的交汇点,其中一条线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另一条线则是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以此为落点,辉映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多彩景观,生动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处在文化边缘,少数民族女作家们仍坚守女性立场,以独特的女性经验和意识,审视、反思现代化背景下本民族文化,同时言说着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书中所讨论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传承,至现代理应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实践便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女作家笔下的民族故事异彩纷呈,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内核难以磨灭。作者发现,她们延续着中华传统审美意识,致力于书写和谐之美,在现代语境中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并能够自

觉地再认识、再创造,彰显出主体自信,少数民族女作家以手中的笔,完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创造。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极为详实的理论研究,下篇则是文学个案分析,显示出研究的严谨性与完备性。上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学说和毛泽东女性解放思想,从文化身份、地域文化、审美关照、文化记忆、文化创新、女性叙事等角度架构理论。如此巧思,一是为下篇的文本细读打下坚实理论基础,二是从不同侧面、从宏观角度阐释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形成原因及样貌特点,使得下篇的微观个案分析随之欲出。下篇聚焦于获得“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选取了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回族、布依族、彝族六个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优秀作品展开分析,通过文本微观诠释少数民族女性书写的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传承与创新。一组组文学个案与上篇的理论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各个民族的女性文学都在经历着文化认同、审美表达、文化创新等环节,同时,作者还注意到了各民族女性文学作品中独特之处:满族女作家的共荣共生文化意识,草原文化对蒙古族女作家的影响,达斡尔族女作家笔下的神秘美学,回族女性文学中的生命意识,布依族女性文学融合古今的美学意蕴,彝族女作家坚守的诗性传统……作者在结语中指明,在这些独特

的闪光点背后,是“多元共生、互补互融的中华文化传统”在发挥作用,这些闪光点最后都是聚拢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底子上来,在“共性”的基础上,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个性”才得以彰显,显示出文学创作在文化传承中的审美价值和独特作用。

在上篇的理论架构中,该书开篇并未直接探讨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认同问题,而是先从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化身份入手,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作者敏锐捕捉到少数民族女作家拥有特殊的文化身份,是由地域、族别、性别三种属性共同构成。多重文化身份决定了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写作姿态,决定了她们如何带着民族的、女性的声音与现代社会对话。谈及文化身份,便涉及身份认同问题。该书作者告诉我们,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多重文化身份认同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来完成的。她们的作品不但书写了本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还展现出本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内容,甚至以文化自觉的姿态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该书作者明确指出这些关键点,凸显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广博的文化包容性。此外,该书充分挖掘了女作家创作中独特的审美关照,这是女性身份带来的独特视角。女作家从边地文化中汲取文化传统,创造出思乡恋乡的美学,挖掘独属于她们的空间化美学;同时,她们还在自然美学的感召

下关注女性生命和女性自我,以美的眼光对生命发出终极追问。因此,文化身份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使得文化认同、女性经验、女性审美观照等方面交相辉映,映照出少数民族女性书写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认同。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生发以来便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该书另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是从文化空间的角度思考文化认同与传承问题。此处的空间既指承载地方文化的地理空间,也可以指文学文本中构造出的叙事空间。譬如,江南文化是从奇山秀水、湿润气候等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从这里成长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具有安静、自由的诗性品格。书中以壮族女作家岑麒青为例,生动论述广西山水滋养文学创作的过程。除了地理因素,老屋、旧屋、庭院也是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心灵居所。老屋承载着对传统家文化的怀恋,其实质是民族文化、国家文化的象征,在她们的书写中完成民族地方文化的回顾与审视。在封闭的庭院中,女作家的思绪并未困在此处,而是将庭院化为独属于女性的天地,让角色徜徉其中,使得女性的创造力得以释放。从文化空间的角度剖析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可以说是该研究领域内的创举,据此透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文本生成原因,明晰文本中细腻的女性意识,反映出少数民族女作家对中华文化的深切关怀。

《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是一本极为扎实的研究著作,凝聚着三位女性研究者的心血。该书论述的中文文学作品达七十部之多,参考文献上百篇,如此浩繁的材料在三位研究者的笔下精妙合一,生动诠释了女性研究者细致严谨的治学态度。随着该书拓展的研究视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前景广阔,仍有深入挖掘研究的空间。

(作者为广西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师)